

# 饶宗颐与《古史辨》第八册弃编

邓聪



1990年12月7日饶宗颐(前排右一)、利荣森在大湾遗址现场考察



1990年12月5日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六号墓出土商代玉璋及串饰

饶宗颐先生(1917—2018)字选堂,号固庵,学界尊称为饶公。饶公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集学艺于一身的国学泰斗。2023年2月为饶公逝世的五周年,中华书局(香港)出版《一纯万岁寄遥思——饶宗颐纪念文集》(2023年1月),书中汇集国内外二十多位曾受教于饶公的学人,一同撰写缅怀文章,铭记先生培育之恩,情真意切。本论集由故宫博物院王素先生命名,取意饶公自谓“夙慕庄生参万岁而一成纯”,以“并日夜而遥思”,追怀饶公。

我在本书拙文《春风拂璋——追怀饶宗颐》,原意是写饶公对香港考古学的贡献。然而,意外发现饶公由于香港及越南考古的新发现直接的刺激,竟相继发表涉及早年他曾负责编撰《古史辨》第八册后被搁置的真相。事实上,《古史辨》论集创始人顾颉刚先生,被誉为我国近代史学界的“无冕之王”。《古史辨》皇皇巨著,自出版以来几为学者所必读,影响迄今不息。另一方面《古史辨》第七册后来停刊,其中关键编撰人物就是饶公。长期以来,饶公对《古史辨》第八册搁置一事,没有过多的解释。学术界均以《古史辨》的出版戛然而止为憾!1991年顾颉刚先生弟子刘起钎,在北京曾发表过文章触及顾、饶间《古史辨》第八册在香港编印计划的传说,由于战乱中全稿丢失。刘文虽因未得知真相有所失实,但也算是20世纪90年代重提《古史辨》停刊的发端。

这次《一纯万岁寄遥思》书中,凑巧北京大学荣新江及唐晓峰两位教授和我三人,不约而同同谈及饶公与《古史辨》第八册后来的消失。据荣新江教授谓,约在1995年前后,“饶公在和我们聊天过程中,经常说到顾颉刚先生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因为停刊而未出版一事。”这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饶公改弦易辙,很着意回与顾颉刚先生关系及《古史辨》停刊的问题。另外,唐晓峰教授在上世纪之交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期间,特意请饶公重提自己与《古史辨》第八册去向的旧事。在唐教授协调下,饶公1999年于北京《九州》第二辑发表了《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对以上问题做了正面的回应。20世纪90年代初,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契机,突然让饶公愿意重提《古史辨》在自己手中弃编的原委?这方面似乎迄今学术界并没有直接的触及。现在看来其中原因,既有顾、饶间学术上私谊感情纠结,也受到了来自意想不到考古新发现的刺激。而近代中国史学上意义重大《古史辨》之所以停刊一桩悬案,最后还是得以水落石出。

此事情节仍是先从顾、饶关系讲起,其次再联系到考古学术新发现方面的解释。饶公是1917年出生。在1930年代中叶,当年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先生,已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学的泰斗。1935年饶公仅为18岁青年,已在《禹贡》第二卷发表学术文章,并很早就成为禹贡学会会员。1937年顾的学生董书业为《禹贡》主编古代地理专号,其中饶公有两篇史地文章得到董的好评,并为顾赏识,获选刊登。顾先生对年轻饶公的青睐,使初出茅庐的青年饶公,视顾为自己“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顾对其时仍十分年轻但学问又十分老到的饶公,非常欣赏,寄望饶公继承发扬他所推动的古史辨运动工作。

顾曾指导饶公从古史地名形成过程入手,发掘古地名由层累造成的历史。最迟在1940年代初,顾已委付饶公《古史辨》第八册编辑的重任。从1926年开始《古史辨》论文集已出版共七册,取得国际上很高的声誉,部分内容被翻译为英语、日语。饶公获托付《古史辨》第八册主编,在开始数年也曾配合自己工作。然而,意料之外是《古史辨》第八册却一直未有面世。近代中国史学最有影响力《古史辨》历史论集系列出版,在饶公手中竟戛然而止。

我们知道,1930年代日本侵华,接着二战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等。这一连串社会动荡因素,可能严重影响饶公的生活和研究。1941年7月6日,饶公从香港去信国内顾颉刚先生,谈及《古史辨》第八册的编写,表示当时仍在努力,只是“仍未完稿”“歉疚奚似”。然而战后,自1952年饶公在香港大学任教起数十年间,就一直未有再提及《古史辨》第八册的旧事。今年饶公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一纯万岁寄遥思》,学者们对饶公与《古史辨》第八册消失的问题,尤为感兴趣。唐晓峰的《饶公与“古史辨”》(原书173—182页)文章,是目前所见对此问题最深入分析的研究。而饶公重提《古史辨》第八册旧事,已经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阶段,其中一个重要诱因,竟是与近年香港、越南田野考古发掘有关。而本人正是该两地的考古发现担当者之一。为讲清楚其中来龙去脉,就要回到1990年香港中文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在南丫岛大湾遗址的发掘工作说起。

1)1990年12月5日,从南丫岛大湾发现商时期墓葬群,出土夏商风格大量的玉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璋和玉戈(软玉)等文物。同月7日,饶公与北山堂主人利荣森先生、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王人聪先生、故宫博物院杨伯达先生,亲临大湾考古现场,考察玉器出土状况。

2)1992年11月,饶公和我被邀前往越南河

内,参与法国远东学院与越南社科院考古学院合办古越文化会议,了解战后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冯原文化中,出土商代风格玉器如玉璋等新的考古重大发现。1996年及2002年,我与越南社会科学合作发掘海防省长靖遗址及富寿省 Xom-Ren 遗址,又发掘出冯原文化中包含大量商代风格的玉器,其中也有精美的玉璋。

3)1994年饶公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牙璋会议。饶公主题演讲《牙璋与古史地域扩张》,以牙璋在中国及越南广泛分布及传播背景,首次对顾颉刚先生古史方法论提出商榷。

4)1999年应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邀稿,饶公在国内《九州》第二辑发表《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讲述“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

5)2003年在台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共二十册出版,第一卷首篇《论古史重建》,第三度重提详谈自己与《古史辨》及顾颉刚先生的关系。

在1990年前饶公对《古史辨》第八册的去向保持缄默,原因正如饶公后来自述,“主要是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了”。对过去顾先生主张“把古史地域的尽量缩小,同名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的推理方法,为饶公“无法接受,只有失望”,“决定放弃第八册重编工作”。“遂使古史辨仅留下只有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我估计上述饶公的想法,是早在1940年代后期已经下定的决心。1950年代以后,饶公不愿意对《古史辨》第八册的旧事重提,猜想其中重要原因,饶公可能是深为饶先生知遇之恩的情意结左右。饶公自谓:“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我结果却交了白卷。”晚年饶公在顾颉刚百龄又冥寿之际回顾,写下“我夙蒙先生延植、汲引、感佩之愚诚云”,正表明顾、饶二人过去唇齿相依的学术关系。这可能是饶公来港后很长期间,不对《古史辨》方法论上问题表态的原因。

但饶公在香港大学任教后对古史研究,已紧密结合考古与古文献二者互相提携,殊途同归,相得益彰。这在《一纯万岁寄遥思》我的《春风拂璋——追怀饶宗颐》拙文中,对饶公在港考古工作有简略分析。当然,古史辨学派的辨伪科学精神,一直都为饶公所服膺和贯彻实践。饶公自谓:“仍是循着顾先生的途辙,是顾先生继承者。”

其次,顾颉刚先生是在1982年12月25日在北京离世。正如饶公自谓:“不敢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正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1990年香港南丫岛大湾出土大量商时期玉器,如玉璋、戈、钺、有领环、玦、琚等。商文化波及南中国珠江口尤其香港冲击性的发现,对饶公古史地域扩张思想影响一定不小。饶公多篇论文一再提及香港出土牙璋的重大学术意义。1992年秋,饶公和我首次在越南北部,亲睹冯原文化中包含商代风格大量的玉器,更加强饶公认识中原古史扩张力度的强大,绝非顾先生从前思路可以理解。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所召开国际牙璋会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编撰《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论集》出版,学术界反映东亚龙山时代以来,夏商之间在东亚牙璋广域扩散分布综合的研究成果,为饶公在会议开幕式主题发言《牙璋与古史地域扩张》,提供了很多佐证科学的根据。

饶公晚年回顾谓:“一个人的学术旅程,往往是曲折的,亦同样是‘层累造成’的。我和顾老的结缘,将近七十年,追述往事,好像重温一遍《云烟过眼录》。《古史辨》的中断,我应有责任,至于至今仍耿耿于怀。古史重建事业中的史料辩证和整理工作,由于考古学的发展,新材料陆续出现的不断挑战,相信大家都会持续下去,再接再厉。”这其中可品味顾先生“层累造成”说,已成为饶公的人生观:“考古学的发展,新材料”又成为饶公心仪古史重建,得以进入“新时代预流”学术舞台。

1990年代以后,可以说早年潜伏在饶公心底对古史重建的抑压,对顾先生主张“古史地域应尽量缩小”的史学观,发出强烈的学术挑战,直截了当地说“顾先生过去的狭隘观念,应该重新检讨”。此时饶公所高举“古史地域扩张”的旗帜,提出这才是夏商周三代历史发展的真相,华夏文明自中原向南方广域扩张,一泻千里而下。饶公半世纪前对古史辨研究方法的困惑,也适逢1990年在香港南丫岛考古新方法的发现,得到直接的启示。《古史辨》第八册在饶公弃编没有完成的人事与学术背景,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 薪火相传 学术永生

——怀念陈旭老师

李维明

2022年12月28日下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陈旭教授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我痛惜与无奈、悲伤与怀念,思绪交织、难以平静。翻阅40年前老师《商周考古》课笔记,再读老师的来信,重温老师的教诲,仰止老师的学术贡献,在追思中感悟老师的学术精神。

## 薪火相传

1977年,陈旭老师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参与创办考古专业,开始《商周考古》教学与科研工作。

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是1982年2月9日(星期二),当时我是郑大历史系历史专业大二本科生,旁听她为同级别考古专业讲授的《商周考古》课。老师随上课铃声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她那黑色框架眼镜透露出学者的气质,庄重严肃。这节课内容是总论,涉及二里头文化及夏文化、商文化确定商为信史、周文化的新发现,夏商周考古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等。老师讲课声情并茂、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把朴素的学术内涵讲得十分精彩,从中可以感到老师对材料熟知和精确把握以及对考古学术事业的热爱、敬佩之心油然而起。

课程期间多次向老师请教,老师特意送我一张她亲手绘制的殷墟房址壁画遗迹资料,提示我在读书时要随时记录,积累材料。按照老师的点拨,我在课余时间阅读了郭沫若《我与考古学》,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郑州商城即汤都毫说》《郑州二里岗》《长江下游商周青铜器的若干发现》《上村岭虢国墓地》等考古学论著并阅读读书笔记。

为配合教学内容,老师还安排了教学参观,师生亲临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洛阳北窑等遗址,观摩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遗存,聆听赵芝荃、郑光、郑振香、杨宝成、叶万松等考古专家介绍相关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状况。教学参观使我明白了田野考古实践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考古研究成果需经田野考古实践检验的道理。

课程结束时,我作为历史专业学生参加了《商周考古》课考试,试卷分数竟然很高。老师希望我今后继续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打好基础,要有探索精神,珍惜大学这四年黄金般的时光。后来,老师把我调到考古专业,指导我的毕业论文《试论商代青铜工具》,使我经历了搜集资料、排比分析、归纳分期特征的研究过程,初步了解器物类型学的方法。老师不厌其烦、严格要求,期望我这吐青的小苗日后能够成材。毕业后,中原地区夏商考古一直是我不关注的学术重点,这是当年深受老师的学术影响和传承的结果。在我心目中,陈旭老师是我走上夏商考古研究之路的启蒙者和指路人,是我的学术恩师。

1986年,我考上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邹衡教授的研究生,知悉邹先生曾是陈老师的老

师。陈老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求学时就听过邹先生的《商周考古》课,她的田野考古也得益于邹先生的指导。我在山西曲沃村遗址考古实习时,陈老师来信信中写道:“我在校读书时,先生带着我们在北京昌平雪山遗址进行实习,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加上天气寒冷,先生每天奔波于工地之间,给我们讲解和具体指导。我们班同学谈起来都说,毕业后能够从事田野工作都是和邹先生当时对我们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先生的身教足以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至此,我明白了陈老师的学术底气,体会到一段师生的学术传承。所以,在我的学术道路上,一直以邹衡先生、陈旭老师为楷模,认真做事、踏实治学,以学术研究成果回报老师当年的期望。

时至今日,陈老师教过的本科生和指导的研究生已经在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她参与创办的郑州大学考古专业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在田野考古、教学领域、文博事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同时又培育出新一代考古人,学术接力、薪火相传。

## 学术永生

陈旭老师为人师表,深受学生敬爱。陈老师知行合一的人格魅力和极具感染力的语言表达艺术外,根本是以丰厚的学术底蕴为支撑,帮助学生了解学术前沿信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启发学生的学术创新意识。

浏览老师考古学经历,1958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专业),学习考古知识。1961年在北京昌平雪山遗址考古实习,深受邹衡老师田野考古的影响。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参加郑州商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整理洛达庙、二里岗、董寨等遗址发掘资料,熟悉当地龙山和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并将洛达庙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为以后从事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打下坚实的田野考古基础。

1977年“河南登封成造遗址发掘现场会”有关夏商文化性质的讨论,对她影响十分深刻。讲夏商周考古课,夏商文化性质是首先需要做出判断的问题,她带着问题参观河南临汝煤山、洛阳钼李、孟津小潘沟、偃师二里头、密县曲梁、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涿北商城、信阳罗山天湖墓地,山西夏县东下冯,河北邢台夏商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吴城新干大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等遗址并与探讨夏商文化有关的遗存。参与河南长垣宜丘、郑州小双桥、商丘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整理工作。她关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周文化学术研究动态,思考炎黄历史传说、三代文明和夏商史等学术问题,做到学术知识面的广博。同时,她又以夏商首都所在的河南省为重点,以郑州商城研究为基础,承上启下,建立具有独



学术研究中的陈旭老师

到见解之处的夏商文化研究体系。

1983年,她发表《郑州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一文,首次提出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由原来认识的商代早期提早至夏代末期,从考古学文化编年上进一步充实了郑毫说的论据。邹衡师评价“一般学者都认为郑州商城起始并终于二里岗期,陈旭教授则认为郑州商城起始于南关外期,终止于白家庄期,使郑州商城的许多现象都可得到圆满的解释”。

1991年,她发表《商代版都探寻》一文,首次提出位于郑州商城西北方向的小双桥遗址为文献记载商王仲丁所迁的版都,进一步完善了郑毫说的体系。邹衡师赞扬“陈旭教授……首次提出并全面论证了小双桥版都说,在商代考古与商代历史研究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其在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意义自然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了”。

2002年,她接受《东方家庭报》的专访,受聘为“启封郑州商代文明”栏目之郑州商城系列报道的学术顾问。她认为郑州商城是商代第一都,郑州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第八大古都。在她的建议和推动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国古都学会、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11月30日,在北京举办了“郑州商都3600年座谈会”,与会22名专家畅谈郑州商城的学术意义,建议将郑州列入八大古都。2004年11月5日,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会通过决议,郑州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陈老师认为夏商文化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对相关考古学文化进行综合研究,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理顺,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经过长期艰苦的学术研究,她对夏商文化逐渐有了系统认识: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煤山类型是先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郑州商城是商汤都毫,偃师商城是早商陪都,小双桥遗址是仲丁所迁版都,涿北商城和小屯殷墟均属盘庚迁殷之地。她坦言:“我从不盲目乐观,生活的里程上少不了坎坷和艰险,只有面对现实,不懈地努力,尽职尽责,扣心无愧。”她以平常人平常心接受尘世与学术的历练并取得了不平常的学术成就。她历经数十年完成的学术论著《夏商考古》《夏商文化论集》《夏商文化研究续集》是用生命铸就的学术丰碑,永立于夏商学术史。邹衡师曾经赞叹“一位女考古学家,对考古事业如此执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经受多次考验,始终如一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她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

还记得大学毕业时曾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的心情与老师惜别,孰料如今含泪为老师送行竟成了永别。

陈旭老师学术精神永生。

# 怀念石兴邦先生

张晓梧



中: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先生;左:石兴邦先生;右:张忠培先生(地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资料室)

我是见过石先生的。那是我小的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样子。记得有一天,石先生来我家做客,父亲将我拉到先生面前说,这是我老家大、晓悟,快叫石伯伯。石伯伯好!这是我和石先生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也是我们唯一的一次会面。

父亲与石先生的情谊还得从他考古起步的地方陕西说起,这其中有家熟知的华县、渭南考古,也有半坡考古,正是因为半坡考古使他与石兴邦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新成立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一次安排田野实习,实习的第一站是西安半坡遗址,这也是父亲的第一次考古实习。父亲曾经回忆过这段历史,他们实习时房子不够住,他和高明、徐元邦两位同学只能在马厩里,马厩的斜对面放着房东东大爷的一口寿材,寿材头正冲着三人住的地方。三人在马厩中间用一个席子拉开遮住,一半是宿舍,一半就是马厩。

那时已经进入冬天,西安的天气还是很冷的。为了赶时间,大家天不亮就得起床开工,这时乡间的土路还冻得硬硬的,可以踩在上面走,可一到中午出太阳,路面融化了,鞋底粘的到处都是泥,太阳落山了,地面又冻结了。每天考古发掘工作完毕,男同学们把采集完的人骨、兽骨,用蒲包提着回去,放在床下。西安半坡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年底。

其间,我父亲与黄景略、王克林三位同学曾组织过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实物展,把发掘的文物,诸如陶器、石器、鱼钩等摆出来,三人轮流做讲解员。这个展览引来了众多的村民,人数多达上万人,村民也许第一次看展览,觉得很神奇。石兴邦先生也看了展览,赞叹道:“这一班的学生对考古很热爱,很有激情”,这一展览“开创了考古学走向群众的开端”。

石先生主持的半坡遗址发掘创立了“半坡考古范式”,开创了国内全景式聚落考古的先河,催生了中国第一个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但在石先生的心中,半坡考古还不止这些,在他的口述史《叩问远古的村庄》一书中,他提及了俞伟超、杨建芳和我的父亲张志

写,得以完成,实一大佳绩,甚为感念。前面1.5万字的前言部分原来由我写的,后面我请您和文明写,不知成否?

您谈的培养人才一事正合时势及需要,所言甚是,希望您能为此受些辛苦。上次在我家谈后,我即向×××同志谈了,他当时就表示赞同,并力争实现,我近日和他谈及此事,他已向局里诸领导说明此事,并特别提到您,要把您挖来,现在做西大工作,他和现任校长是同窗好友,也不成问题,我和他商量发信向省长荐言,志在今年暑期实现,因为培养人才,人心所向,力争使其实现,文物局已向省长提出,为高级研究人员新建一处高级宿舍,初步已得到同意,我想对工作、生活条件将在全国走到前面,这样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在考古上搞一个中心(东方文化中心)是不成问题的,这是我的想法,希望您以后能建业,落脚西安就理想了。

向马老师和孩子们问好!

谨致  
敬礼

兴邦  
2000.4.6

石先生是中国史前考古的重要开创人。他致力中华文明的探索,专注于史前考古研究,出版《西安半坡》《临潼白家》等多部学术专著以及发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新石器时代体系及其相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等论文百余篇。石先生为陕西考古倾注大量心血,搭建了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基础框架,并前瞻性布局考古工作,为陕西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22年10月,当我得知石先生走了的消息后,一种莫名的悲痛袭上心头。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先生的面容已经变得模糊了,但在我心目中,他的形象永远是高大的。特整理出上述这些文字,来纪念我心中的石兴邦先生。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信一  
忠培同志:  
来信和稿子都收到了。  
您这稿子写的很好,很实际也很有分寸。  
尹达同志的纪念文集,决定出,十月份或十一月份交定稿,我希望您写一篇,评价他的事功也好,写一篇学术论文也好,作一纪念是我们理应为,希望您能完成,十月下旬,我在北京,您可寄到考古研究所。  
《史前研究》从明年起由考古研究所主办,我想使他成为史前研究的机关刊,能反映这一学科面貌,请您多写文章寄来。  
叩颂, 研安。  
兴邦  
1985.10.4

信二  
忠培同志:  
您好!  
来信收到,甚喜,关于“史前文化”一书,幸亏您和文明同志通力合作,英俊后生奋力挽